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大国关系

在中英关系“黄金时代”深化双边合作

——访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女士

□ 本报记者　史小今

记者：中英关系近两年来不断升温，尤其是去年10月习主席访英，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被社会各界评价为开启了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您怎样评价目前的中英关系。

吴百纳：中英双边关系的“黄金时代”的确振奋人心，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种关系将重点集中在习主席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强调的三个领域：发展我们两国未来的经济；共同努力应对迫在眉睫的全球问题；发展中英贸易投资联系。

在习主席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我们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对于我们两国来说，是一种双赢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将在未来就全球面临的挑战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如叙利亚问题、气候变化、埃博拉，以及一个可持续的伊朗核协议等。

中英两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已达到历史新高——在习主席访问期间，中英两国签署了价值近400亿英镑的协议，此举符合两国的经济利益，并为两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牢固的中英关系也有助于促进我们两国的繁荣，我们将在诸多领域加强合作，从科学创新、能源、城市化和健康到深化两国商业联系。比如，今年1月，英国IHG和万达集团签署了一项价值达15亿英镑的新合作协议。

记者：您是去年3月份履新的，我们知道您对中国的情况很了解。您也曾多次表示，在您任职期间，首要任务是维持和发展中英之间日益繁荣的贸易和投资往来关系。请问，这一年来，中英之间的经贸合作有哪些新的进展和亮点？

吴百纳：我于2015年初开始担任驻华大使。时间证明，2015年是中英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随着我们不断深化两国政府、商业和人文之间的新联系，我们建立起的牢固关系也得到不断增强。

有很多亮点值得我们关注，比如中国现在已经成为英国第三大出口国（五年前还排在第十位）。另外，去年一年里，我们双边的联系也为经贸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机遇。3月，剑桥公爵在上海为“创意英伦”盛典揭幕；9月，财政大臣奥斯本访华时提出了英国要做中国在西方最好的合作伙伴的愿景。大家都还记得，习主席在10月份对英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我们宣布了价值达400亿英镑的商业协议——这些协议显示了中英两国之间日益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两国为适应未来经济发展需求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着合作。

举例来说，华为承诺在2017年之前，在英国增加13亿英镑的投资并将把工作岗位增长到1500个。他们还将在英国的剑桥、伊普斯治、布里斯托开设三个研发中心。

英国电网和其中国合作伙伴中广核集团确认在欣克利C核电站展开合作。这个电站将为英国六百万家庭提供低碳电能。

我们从伦敦到伯明翰的高铁也为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机遇，吸引了很多中国投资者，包括万科、万达、绿地集团、复星国际、总部基地、中信建设、华彬集团。

记者：作为驻华大使，未来您会从哪些领域推进两国的经贸合作？有哪些具体措施？

吴百纳：为进一步推动中英两国经济发展，我们需要继续推深、推广两国间的政策和商业互通，在新的领域加强合作，建立更强大的地区间联系，同时确保在中国市场准入的空间进一步变大。

英国特别是在零售、服务、医疗和教育等领域具有领先地位，这能为支持中国在“十三五”时期向消费和知识型经济转型提供巨大机会。英国公司已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创新和发展源泉。例如，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智能手机和设备市场，其中90%的智能手机和设备的芯片都来自于英国ARM公司。英国天然气公司——英国石油公司（BP）和壳牌公司（Shell）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两家外国能源投资公司。

英国公司也期望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方面与中国企业进行合作。我们也鼓励中国企业在英国的发展战略中寻求机会，如北部经济引擎、中部引擎计划和基础设施联盟计划等。我们也将继续分享我们的经验，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支持，特别是在金融服务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方面。

今年，我们期待着卡梅伦首相到访中国参加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同时也欢迎马凯副总理来访英国与我们的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举行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上述活动都将成为实现我们“黄金时代”宏伟目标的关键机会，而这些雄心勃勃的新举措也将会为我们两国获益。



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女士

在今年中国担任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的情况下，我们已与中国进行了非常密切的合作。中国主席国的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此框架下，英国与中国共同主持反腐败、绿色金融和创新三大工作组。促进全球贸易和应对新的全球威胁（如抗生素耐药性）亦对实现这一宏伟议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记者：在金融领域，英国是首个决定加入亚投行的七国集团发达国家。您认为英国未来会在亚投行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吴百纳：英国非常高兴地看到，亚投行在今年1月举行成立大会后，现已进入正式运作，同时，丹尼·亚历山大爵士受任命为亚投行的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英国是七国集团（G7）中首个决定加入亚投行的国家，我们积极参与亚投行的各项工作。英国将和中国共同致力于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供支持。

亚投行将有助于运用多边和双边发展机构的可用资金池，以此弥合该地区基础设施融资需求的资金缺口。

英国作为亚投行成员可为英国和亚洲带来绝佳的投资和发展机会。加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互联互通将使整个全球经济受益。

记者：目前，伦敦已经成为继香港和新加坡之后的第三大人民币离岸中心。您如何看待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和前景？

吴百纳：在过去十年中，人民币在国际市场迅速崛起，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惊人增长速度和国际化趋势。随着中国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不断发展，人民币国际交易将在未来几年继续保持增长趋势，我们欢迎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IMF SDR）篮子。

我们正在把伦敦放在这一发展潮流的核心中来。伦敦作为人民币外汇交易中心有领先地位，在此基础上，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和马凯副总理于去年启动了“沪伦通”的可行性研究；中国人民银行选择在伦敦首次发行离岸人民币票据；同样，英国财政部也选择在伦敦首次发行人民币计价的离岸主权债券。

我们还与中国农业银行率先在伦敦建立了世界领先的绿色金融中心，并于去年在伦敦发行了世界首单绿色债券，其中包括人民币计价的绿色债券。

我们期待着借助这些举措，与中国投资者、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进行合作，以进一步巩固伦敦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

记者：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英国也作了积极响应，表示愿同中方积极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展开合作。请问，英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

吴百纳：我们对中国“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为了欧亚大陆更大经济发展，而且也是为了实现一个更加互联世界的愿景表示欢迎。

随着“一带一路”愿景在未来几年将成为现实，英国和中国也在准备着进行合作。英国在国际贸易方面拥有丰厚的经验。英国有许多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都在与中国进行紧密合作，他们在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合作方面也有着非常优秀的经验。

英国在诸多领域拥有专业技能，包括法律、项目融资和管理、绿色金融、设计、教育和高科技等，所有这些专业技能可真正增加中国企业正计划开展工作的价值。我们希望让中英两国的企业和第三国企业齐聚一堂，以保证不同企业的技能可以得到相互补充。

我们还积极推动更多中国企业到英国投资，同时鼓励更多英国企业到中国投资。

记者：2013年，英国推出了“英国工业2050战略”，而中国也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合作契机？

吴百纳：“中国制造2025”是一项旨在全面提升、巩固和平衡中国制造业的宏伟计划。该计划涵盖制造业和信息技术应用，以及公共和私人金融和财政激励措施等。

英国着眼于制造业长远前景的同时，也在研究中国目前和未来的需求和目标；我们希望中国具备英国的工业优势，同时考虑为英国公司提供机会。目前，我们看到两国之间存在着诸多合作机会，其领域包括咨询服务、检测、行业规范、联合研发、融资和投资等。

记者：政治合作方面，过去中英两国在伊朗核问题解决和应对埃博拉疫情等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协作，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加强两国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

吴百纳：我们正在建立一种全新的全球伙伴关系。中英两国未来在全球性问题上将展开更加密切的合作。

我们将在全球共同关心的问题，如阿富汗和叙利亚问题上进一步加强合作。英国外交大臣在今年1月访华期间，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叙利亚局势发表了联合声明。这是中国首次就叙利亚局势与别国发表联合声明。此次声明是中英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明。

我们也在探索在阿富汗问题上和阿富汗政府展开合作的方式。

中国和英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在很多国际问题上紧密合作。我们都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利用国际性的解决方案应对全球挑战，无论是防止地区冲突、维护世界和平，还是解决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我们的合作卓有成效——只需看看为应对埃博拉危机所做出的国际努力、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所产生的积极成果，以及为促成一个可持续的伊朗核协议所发挥的作用，便不难发现双方的合作潜力是巨大的。

在促进全球发展，特别是非洲的发展方面，我们也有共同的利益。

记者：您曾以三足鼎立来比喻中英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人文交往是中英双边关系的三个支柱。请问，目前中英两国的人文交往情况如何？未来还会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推进？

吴百纳：我用中国的“鼎”来形容中英双边关系，是因为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准确。中英两国政府、商业以及人文的关系犹如鼎的三只足，为中英全球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黄金时代提供有力支持。每一只足都同等重要，三足共同支撑两国以多种形式展开更为广阔的合作。

中英两国人文交流每年都在增加。两国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之深之广让我可以从很多具体的领域谈起。例如，仅去年一年，我们就为50万中国人签发了英国签证，比前一年增长了19%。而今年1月英国推出的全新对华两年签证将使这一数字继续增加。同时，我们处理一个签证申请的时间也大多都在7天左右完成，比标准规定的15天快了很多。目前有超过14万中国留学生在英国求学，中国国内还有5万名学生正在通过250多个跨国教育（TNE）项目来获取英国的资格证书。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推出了Generation UK的旗舰项目，目标是到2020年，有8万名英国留学生到中国进行学术学习或工作实习。这两个例子仅仅是中英两国人文交流日益密切的一个缩影。

当然我们正在寻找双方可以进一步开展交流的领域。继去年在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会议上就关注性别问题达成一致后，今年3月，我们在全中国举办了“Be Yourself（做你自己）”的活动，宣传性别平等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今年是英国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和中国戏曲家汤显祖逝世400周年——我们将充分利用此次机会促进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我们也期待未来两国能在教育机构、文化交流、体育、旅游等方面进一步加深合作。

中东国家治理：“回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

□ 田文林

2011年中东剧变前，有关阿拉伯世界治理失败的报道经常见于报端，尤其是联合国组织编撰的《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将阿拉伯世界存在的政治专制、民生艰难、贫富分化、教育落后、性别歧视等弊端揭示得淋漓尽致。某种程度上，2011年中东剧变就是这种国家治理失败的集中爆发。这场剧变本身带有探索国家治理新模式的性质和任务，因而其一度被寄予厚望，称为“阿拉伯之春”。

事实上，在民主政治的发祥地欧洲，同样出现了民主衰落倾向。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目前，欧洲政党加速衰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政党在过去3年里总共流失150多万党员，英国选民入党比例不足1%。丹麦、芬兰、荷兰只有1/3民众相信政党政治，德国和奥地利这一比例为1/4，法国、意大利和许多东欧国家只有1/10或更少的人相信。美国也出现了大规模抗议“金钱民主”的运动。这些迹象表明，民主政治在西方声望日衰，中东国家更不可能将其视为纾解困境的利器。

中东国家治理两大结构性问题

从宏观理论看，数年来的中东民主试验，暴露出中东国家治理两大结构性问题。一是难以把握稳定与改革的关系。过去相当长时期，中东国家盛行威权政体和强人统治，这种政体能够确保政局稳定、提供必要“公共产品”，但长期“超稳定结构”导致政坛一潭死水，乃至出现“家天下”趋势，如埃及穆巴拉克试图“子承父业”；利比亚卡扎菲不允许任何反对派存在，同样存在世袭统治可能。这些国家在2011年中东剧变中陷入动荡乃至政权垮台，部分原因就是民众对这种集权统治模式心生厌倦，渴望新的政治变革。但由于这些国家整合不成熟，教派、部族、民族等潜在矛盾突出，因此一旦中央政府控局能力下降或政权垮台，必然导致教派矛盾升温、部族意识复苏、极端恐怖势力兴起等种种负面效应。政治转型时“一放就乱，一管就死”，这种困境令中东国家探索治理模式之路左右为难。二是难以避免宗教与世俗力量矛盾激化。阿拉伯国家普遍信仰伊斯兰教，并将其定为国教，但现实政治中则实行政教分离。这种道统与法统分离导致中东国家始终存在明暗两条线：明线是世俗政权和世俗力量，暗线则是活跃在民间和地下的政治伊斯兰势力。例如，埃及穆兄会1928年就已成立，该组织只要有机会，便设法进入体制内部；若没有机会，则与政府各行其是，逐渐向体制内渗透。因此，中东只要出现重大历史变动，总会出现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身影，并因此加剧教俗矛盾。

2011年中东剧变中，埃及的穆兄会及其隶属的“自由与正义党”、突尼斯“复兴运动”、利比亚的“正义与建设党”等处于蛰伏状态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打着反对独裁统治、增强民主合法性的旗号应运而起。埃及穆兄会背景的穆尔西还在2012年选举中当选总统，并在掌权后推行“伊斯兰化”政策，由此导致世俗与宗教矛盾白热化、公开化。埃及军方2013年7月罢黜穆尔西，并在反恐名义下关闭27000多家宗教场所，1400名穆尔西支持者被杀，1500人被监禁。穆尔西也以间谍罪被判处终身监禁，穆兄会领导人巴迪亚被判25年徒刑。在此背景下，穆兄会暴力化倾向增强。2015年6月29日，负责审理穆尔西案的总检察长遭袭身亡。2015年7月，13名穆兄会成员涉嫌在苏伊士运河区域布雷被捕。由此使埃及陷入“深刻而尖锐的社会分裂”。“要么是世俗独裁，要么是伊斯兰民主”，这种两难处境令阿拉伯国家左右为难。中东国家探索治理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迷茫。

中东转型国家 “民主冷漠症”

从实际业绩看，数年来的民主化实践未使相关国家情况好转，反而变得更加糟糕，处境普遍“今不如昔”。

埃及是典型例证。2011年政权更替以来，埃及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外汇储备由穆巴拉克下台前的360亿美元降至2015年底的164亿美元；外贸赤字从2013—2014财年340亿美元，增至2014—2015财年的390亿美元；财政赤字每年增加10%，2015年埃及债务占GDP的100%。埃及旅游业也因安全形势恶化明显减少。埃及民众感受也极为悲观。据“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埃及民众对生活满意度连年下降。用“从1到10”衡量民众满意度，埃及2005—2007年得分5.4，2010—2012年得分4.3，2012—2014年仅有1.13分。在连续三年的报告中，埃及均被列为“不幸福”。2016年2月24日，塞西在公开演讲中，谈及埃及经济困难时甚至表示，如果对国家经济真有好处，他情愿卖掉自己。因此有人认为，埃及根本不需要反对派，只要坐等就能看到国家完蛋。

突尼斯政治转型相对较好，但经济和安全形势并不乐观。目前，突尼斯面临“非常困难的形势”，失业率达到25%，青年人失业率达40%。2016年1月21“茉莉花革命”五周年之际，突尼斯爆发上千人抗议，冲突造成数百人受伤。与此同时，突尼斯安全形势恶化。突尼斯参加“伊斯兰国”人数居阿拉伯国家之首。目前已有6000多名极端分子返回国内，国内安全形势严峻，并由此严重打击突尼斯旅游业。2015年1月至11月，突尼斯游客减少26%，旅游收入减少33%，GDP增长率几乎为零。突尼斯面临“越乱越穷，越穷越乱”的恶性循环。

事实证明，指望通过“民主化”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中东的治理模式危机并未解决。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2011年中东剧变时，中东地区失业率为25%，目前已升至30%，是世界平均失业率的倍数。根据标准普尔的报告，2015年阿拉伯世界11个国家的政府债务达1430亿美元，相比于2014年的706亿美元增加一倍，预计2016年政府债务仍将居高不下。另据联合国对156国“幸福指数”排名，埃及列130位，摩洛哥排99位，突尼斯排104位，伊拉克排105位。另据“阿联酋战略论坛”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的数据得出结论：“阿拉伯之春”及随后政局动荡，使相关国家付出8300亿美元的代价。“当前中东比‘阿拉伯之春’前变得更不稳定、更看不到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当前中东转型国家普遍出现了“民主冷漠症”。根据位于卡塔尔多哈的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年阿拉伯舆论指数报告》，2012—2013年，61%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之春”及其后果是“积极的”或“在一定程度上是积极的”，只有22%受访者持否定态度；2014年两种观点大体持平，分别为45%和42%；到2015年，持否定态度的受访者达到59%，首次超过支持该运动的民众。

“回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

展望未来，这些中东国家面临“回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多数国家已无法回到过去。当前中东乱局持续，促使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稳定与秩序的极端重要性，“人心思稳、人心思定”成为大势所趋，但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埃及算是非常幸运的，该国尽管发生政治剧变，但原有国家机器和政治框架基本保留，因此尚有条件“原路返回”。事实也是如此，2013年7月埃及军方强行将民选的穆尔西总统赶下台，并将恢复秩序视为优先要务，强力镇压了穆斯林兄弟会、“四月六日青年运动”等各类反对派。2013年7月以来，塞西政府已关押了4万多人，乃至有人感叹当前埃及的镇压行动比穆巴拉克时期还严重。但不管怎么说，埃及毕竟逐渐回到稳定与秩序轨道上，经济恢复正有序展开。然而，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遭受外力干涉的国家，由于原有国家机器已被彻底打破，导致部族武装、教派冲突等各种原生性势力势如泉涌，由此进入到近乎不可逆的“碎片化”过程。无论是自身条件还是外部环境，这些国家重新出现枭雄式人物、重建威权政体已经不可能。换言之，这些转型国家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

另一方面，中东治理模式也看不到未来。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中东几乎成为世界各种意识形态的试验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伊斯兰主义先后在中东舞台登场亮相，但均未使中东国家摆脱困境。“民主转型”本来是中东国家探索国家治理新路的最大希望。而2011年“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意味着来自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同样不能解决中东面临的问题，反而加剧了中东的意识形态危机。“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当前中东就面临这种困境。

笔者认为，中东国家要想实现繁荣发展，不应在政体改革这一次要问题上“打转转”，而应首先明确“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2011年中东剧变中，抗议者的口号就是“面包、自由和社会公正”，表明这场剧变应是一场涉及广泛的全面社会经济革命。但迄今为止，这种变革主要限定在政治体制等上层建筑领域，始终没有抓住核心问题。“这场阿拉伯革命几乎没有产生领导人，没有像样的行动计划，没有真正的理念。”由于未触及社会经济基础，看似轰轰烈烈的“阿拉伯之春”，最终变成“只开花不结果”的“假革命”。

热点透析